

内容提要

本文集收录了近十年来台港刊物发表的影响较大的五四论文十六篇。这些论文从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视角，重新审视了五四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并探讨了中国文化重建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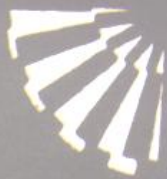
# 启蒙的价值与局限

——台港学者论五四

五四与

现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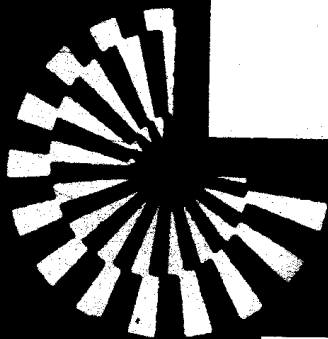
丛书



# 启蒙的价值与局限

——台港学者论五四

编者 / 萧延中 朱 艺



山西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0657

## 启蒙的价值与局限

——台、港学者论五四

萧延中 朱 艺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203-00897-5

K·40 定价: 3.00元

##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 总 序

发生于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七十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时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而使五四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显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题。这一切不无悲剧意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

2076/20

须从五四重新开始。这种重新开始，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个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与复兴历史关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

有感于斯，值此“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编就了这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丛书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而如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形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对繁荣五四和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能对广大关心民族命运和文化前途的读者有所裨益。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1989年1月于北京**

## 目 录

- 〔 1 〕周策纵 论五四运动
- 〔 5 〕胡秋原 评介《五四运动史》
- 〔 18 〕周阳山 五四与中国
- 〔 31 〕金耀基 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
- 〔 46 〕张 颢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 〔 74 〕余英时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
- 〔 86 〕谭志强 传统与现代
- 
- 〔 100 〕张玉法 五四的历史意义
- 〔 110 〕周玉山 五四运动探实
- 〔 124 〕王德昭 论五四运动对文化遗产的继承
- 〔 146 〕洪长泰 由五四民间文学运动看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
- 〔 150 〕王自扬 知识分子的出路
- 
- 〔 154 〕周明之 从胡适的婚姻看“五·四”思想文化的冲突
- 〔 183 〕汪荣祖 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
- 〔 196 〕陈晓林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论五四时代的“少年中国学会”
- 〔 208 〕陈曾焘 一个群众运动的形成基础

# 论五四运动

周策纵

问：周先生写《五四运动史》的动机是什么？

答：我研究“五四运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中学时代我已经有写“五四”的历史、意义和批评的理想。在初中时，正经历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和后来的抗日运动，我已开始谈及“五四运动”。到了高中时，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诗，题目是：《五四——我们对得起你》，讲述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学生，对得起“五四”的传统。至于我写《五四运动史》的其中一个动机，亦是提出学生在这个运动的传统里，要有一种使命感，应该关注中华民族传统的命脉。

“五四”是一个政治性的爱国运动，对外强作出批判，亦是整个文化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检讨基本的“五四”问题，特别是在文化、传统方面，加以比较。从历史、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很广泛、很有深度，所以我们要检讨一下，研究一下。

国内研究“五四”的文章很多，但写成专书不多。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很多人都是从他们的信仰出发写“五四”，我觉得我不应该从一个固定的观点或信仰来写这样一个运

动。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对于“五四”历史事实的发展经过，没有一个人来做一个详细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先把“五四”的历史事实弄清楚，解释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因为很多人未弄清楚历史事实，便先从个人的信仰和观点去看“五四”，所以我写“五四”的另一个动机是要把事实澄清一番。当然，每一个人写历史都有一定的主观，不可能绝对客观，但我要尽量客观的去写“五四”；假使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我便尽量的写出来，自己做一个判断，也让读者可以作进一步的考察，做他们自己的判断。

问：“五四”的精神是什么？

答：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讲“五四”的精神：

(1) 在政治上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保障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争取“中国人的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是说有它的最高主权。中国人的民主国家观念是要有一个主权的观念，在英文来说是“Sovereignty”。“五四”对主权的观念虽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但是说我国的主权不能让人家来侵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抗强权的观念。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要抵抗外来的侵入，要富国强兵，这个观念当然在以前已经有了，不过到了“五四”，不单是一个自强运动，也是一个现代化运动。中国人在思想方面有了改变，对中国整个文化以批判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的变化，不单止是在政治方面，在整个文化思想方面，都有了一个基本的改变。

(2) “五四”另一个基本精神，是检讨中国的一切，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价一切。这种思想成为一种推动力，不单止对中国传统作彻底的批判，对其他国家的思想也有批判



式的接受，最后目的是要有新文化的产生，歌颂文化中的优点，抛弃文化的缺点。

但当时比较年青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些矫枉过正。表面看来，批判中国传统是他们的重心，好象尽量在破坏中国的传统，好象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否定。这点，我们现在看来，是过火了一些。他们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的家庭制度。当时以家庭为基础的思想有支配的力量，青年要打破这种束缚，非要加以矫正不可，但变得了过火一点。当时的保守派认为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是对的，越老越好，这种传统的束缚很大，假使不把这个传统的束缚打破，很难有自由的思想。

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解释“五四”这个运动，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破传统。表面上是完全反对传统，这样便把中国传统里的很多优越的东西也没讲到。

可是，这种反传统精神在当时是必要的，反正总会发生的。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只有传统和最古的东西是好的。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已提出了那个“新”的观念，他说新的就相当好，比旧的更好。这种观念是不容易生根的。梁启超在这方面，有先驱的作用，但他到底也没有影响很多知识分子来转变这种观念。在“五四”，这种观念就更普遍了。老的东西，有的当然并不坏，有的真的越老越好，但若果弄得过火，没有创新观念，也是麻烦的。

“五四”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它的历史意义。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我们现在来批判的话，那并不是说这都是公平的、完全正确的，因为新的也不完全是对的，这点大家很容易了解，但当时确实有它的历史意义在内。

(3) “五四”另一个意义，是在那四、五年左右思想界的自由发展。在不同的思想之中，当然会有某种冲突，但在那个短时期内，那些提倡新思想的人，没有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他们不能干涉别人，所以虽然大家都讲自己的东西，但没有人拚命地攻击别人，并不是拿某种权力去控制别人。当时的青年不是要建立某种权力去压迫别人，这也是“五四”的基本精神。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发展，这点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战国时代可以比较，那时有很多小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权可以控制全国，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不受到干涉，各讲各的。“五四”在这方面来讲，比战国的时间是短了，但不同的复杂性是超越战国时代的。我把“五四”当时的思想叫做一个“基本的多元主义”，有不同的交流，自由发展。当然，有一些思想主流在里面，但不否定别人，各讲各自的东西。

到了“五四”的后半期，慢慢的，某些青年有了某种政治信仰或思想，利用组织的政党。有了军事和政党的权力，使少数派的意见不能自由发挥。这样的趋势，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不是与“五四”当时的主要潮流有所冲突呢？是不是“五四”的精神变了一个政治思想中心呢？这个问题当然值得讨论。我的看法是：“五四”的基本精神是主张思想有自由发展，自由比赛。

# 评介《五四运动史》

胡秋原

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政治、思想运动的一个无比重要事实。不了解五四，不能了解以后和今日的中国。周先生这一本四百七十多页的大作，是中外文献中关于这一问题最周到的一本系统著作。此书首为导言，下分两大部。

一、导言。先论五四运动定义。五四运动是什么？作者说，此本指民国八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示威运动。但许多人将他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相联。有许多人认为二者无关，而胡适等学者则以为五四运动不当包括新文化运动，并以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称为“文艺复兴”，其中新文学运动又最为重要。许多西方人因胡适英文著作而熟悉这个观点。这又成为一个政治论争。中共既定五四为“青年节”，而国民党则定之为“艺术节”。（周）著等认为五四可以广义使用，不过将“五四时代”限于1917~1921的五年间，虽然他觉得还可放松一点。次论这运动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

第一部分是“这运动之发展”。要目如下：

二、促成这运动之诸力（1917~1918年，国内爱国者之屈辱——二十一条，留学生之热心）；

三、初期文学与思想活动（新青年杂志，北大改革，新

旧之争，反日请愿)；

四、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失望，五四之大示威)；

五、以后之示威与罢工(政府之反应，北京学联合会之成立，全国学生响应)；

六、更进一步发展(六月二、三、四之大逮捕，商人与工人之响应，安福内阁之辞职，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

七、新文化运动之发展(1919—1920，知识阶级之统一，新青年与新潮之主张，新刊物激增与旧派重整，偶像破坏主义，新团体与平民教育运动)；

八、外国态度(日本之反动，西方之同情与怀疑，俄国之宣传)；

九、思想的政治的分裂(1919—1921，主要知识集团之卷入，“问题与主义”，社会政治的行动主义与文化的行动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西化；政治之参加)；

十、社会政治的后果(1920—1922，政治经济组织之新动向，妇女解放，教育改革，后期学生运动潮流)。

第二部分是“主要思潮之分析”：

十一、文学革命(旧文学、白话文、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十二、新思想与传统评价(旧思想核心之儒学；新思想：写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新方法：实用、怀疑、存疑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打倒孔家店”)；

十三、新思想与后期争论(疑古，民族传统之再估价，

反宗教，东西文化论争，科学玄学论争）；

十四、结论：解释与评介（自由派——认为是文艺复兴，改革或启蒙；保守的国民党和传统派——认为是灾害；共党——认为是列宁号召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谁是这运动领导者；作者之解释；成功与缺点；若干进一步的考虑）。

此外他作了一个很有用的年表。由这纲要，可知作者对这运动有关文献，引用得很丰富。他注意到黄达庸是新文学运动先驱，胡适八不主义受德（E. Pound）学，以及杜威、罗素言论对新文化运动影响和他们的批评。他对事实鉴别很细心（但以中共成立于民国九年五月则不确），在全书结构上，很见匠心。

他指出五四运动由统一而分裂，也是很重要的观察。

作者能忠实于史实保持很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自由派、国民党、共产党对五四运动评介都不合于事实，虽然比较同意自由派观点。而在说到谁领导这运动一节，他指出共党华岗所谓李大钊、毛泽东领导五四毫无根据。他也说到国民党人有时认为领导者为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朋。他引胡适之说，“如果没有胡适和陈独秀，白话文的采用可以延迟二三十年。”（见赵家璧编《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又引陈独秀在蔡元培死时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是在中国必然发展。不论得失如何，并非起源于任何人。不过蔡先生、胡适先生和我，应负当时思想和舆论之责任。”（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因手头无原书，胡陈二人之言皆就同君英译重译。）他认为由陈胡二人之说，可以得出谁领导五四的结论。

作者对五四运动的意义、评价提出他的“试论”。他说

五四在本质上是广义的思想革命，但与政治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其目的在求民族独立，个人解放，经由现代化（西化）的正义社会。他是现代中国史上之一分水岭，其基本精神是要“创造新的现代文明来救中国。”作者认五四运动成就，首先是思想方面，传统之动摇，科学之研究。其次是社会的转变——家庭革命，是经济的变化——地主地位之降落，农民的骚动，城市居民之政治活动，劳工问题之起来。于是有政治方面过程，政治与民众与知识分子之更密切关系——国民党之改组，共产党之成立。说到缺点，作者指出三点：

一是在批评传统时，缺乏公平与同情，忽视作家和民族传统之良好方面；

二是对于新观点过于轻信，而不免混乱模糊；

三是他们对于复杂问题过于性急。

虽然这在一个运动初期是都难免的。至于传统派认为五四运动应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之抬头负责之说，作者则认为责任在两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利益支持腐败势力，使俄国能对中国宣传，二是国民党清共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传统的保守的态度。

在有限的配景上，周先生的话，也许只有是否恰当的分寸问题。但是，假如将眼界更扩大一点，则整个图像便要发生变化。我的批评是由此着眼的。

一是关于五四运动之背景。他对于接触现代西方以前的中国有一简单描写：经济上，是地主制度的自给农业，基尔特制的手工业，我想这是错误的。至少是太简单化了。关于中国传统思想，亦用近时西方人的简单分类——儒学与新儒学、法家、道家、佛家；对王阳明的意义影响，几乎无所注

意。说到政治背景方面，他只注意到二十一条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忽视了民国成立后中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心理的背景。

说到五四历史意义，作者追溯到历史上学生运动是不错的，将五四运动看作过去技术上兵工建设和政治上变法革命运动之继续也是不错的，但在社会背景上，所说士绅(Gentry)与新知识分子之区别，只使人印象混乱。须知民初官僚政客军阀，多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又以为五四以前，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五四运动乃是要成立“民族国家”，则是大错特错。中国早超过民族国家阶段了。此外，他对于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如蔡、陈、胡诸人个人思想背景（即他们思想之形成），没有充分注意，也是一缺点。

由这样一个局限的背景看五四，作者将“五四时代”限于1917~1921年这个期间，认为是一个思想革命，而将此革命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归之于中国迅速工业化，屈辱的失败，政治传统之权威性，中国基于合作而非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易于接受理想的社会主义，国民党的政策，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原书第十五页）之论，成为全书观察和判断的骨干，就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样也就必然的走进今日若干美国的中国专家（如费正清教授）的宿命论。中国人住在“黑暗的，国内的，政治舞台”（原书第十页）。一旦受到现代西方文化之冲击，传统解体，这传统到五四归于粉碎，于是许多势力重新组合，便又在传统的权威模式（奇怪，这模式又破坏不了）上，再变为毛泽东的极权主义！

我认为，无论研究五四，无论研究中国当代史（西方人

误称为现代史），决不能照这一公式研究。研究五四背景，必须：

甲、对1840年前的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精确分析；

乙、对1840年来的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构造及其文化思想的变化有一种全局观察；

丙、对1840年来中国救国运动之过程及其失败有一种分析；

丁、对辛亥革命前夕国人思想，以及民国成立以后国人之失望，复古的思想之流行，袁世凯利用这心理，而有孔教运动，帝制运动的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日俄之合作，日本之地位，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的事实与意义；有一种了解。

二、由以上背景才能充分理解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周先生说“五四基本精神是要抛弃传统，创造新的现代文化来救国”，这命题完全正确。但是，这运动的基本目的，毕竟是政治的——“救国”。《新青年》继《甲寅》而起（《甲寅》则创办于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创办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筹安全之后，是一面要保卫中华民国，一面要对抗日本侵略。五四运动更完全对抗日本而起。从此有中国统一独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运动。中国内部不统一不能对外独立，而统一独立运动立刻遭受日本的打击。因此，周先生所引陈独秀的话，说五四时代延长到现在——陈氏之言在抗战之二十七年——是有理由的。参加和主持北伐统一和抗日战争的人，大多受过五四洗礼。所以五四根本是一政治运动。不待说，他是继续中国以前政治运动的。



诚然，这运动有一大特点，即由文化入手，要求新的思想，也意含一个新中国远景。但新青年初期新思潮，例如“德先生”“赛先生”，不是全新的，这是《新民丛报》《民报》早已提倡的。白话文也不是全新的，这是“古已有之”，而在清末已在流行的。新文化运动不过对这一切重加肯定并使其普遍化，并认为学术思想革命是有效政治改革，技术改革之前提而已。

新文化运动所以为“新”，新在一点，即表示对既成势力之普遍失望，将中国希望寄托在“新的青年”，并使青年与人民结合，发动新政治运动。其第一步成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然“新文化运动”又是什么意思呢？何以拥设新文化就要抛弃旧传统呢？这一面是对袁世凯、康有为等的反动和矫枉过正。另一方面，也感于日本之强由于接受西方文化之故（正如过去康有为认为甲午战败是由于日本有政治改革一样），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之耀武扬威，而中国还有“同善社之类”，而中国文学，也显然不如人。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意义乃是最深刻的“中国文化危机”之意识。

然拥护新文化是否一定要抛弃旧传统呢？仅仅拥护西方文化是否就能救国呢？否；在《新青年》八月一日宣言后，经过一年的讨论，显然有进一步认识。今天有超越论，其实这是《新青年》同人已有此了解的，此即八年十二月新青年正式宣言，主张综合新旧创造新文化的宣言（周先生译得非常之好，见原书174—175页），就是想超越中西之争。这宣言代表五四思想水准之高峰，也是其统一力之所在。但周先